

# 临时价格干预何来违法之嫌?

## ■今日视点

当前,保障市场供应、稳定市场价格,缓解价格过快上涨对群众生活的影响,确保群众过上安定、舒心的生活,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近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主要目的是抑制价格不合理上涨,规范市场秩序,稳定心理预期。

但有人提出,行政管制价格有违法嫌疑,提价申报制的法律依据何在。这是对法律不够了解的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当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依据

这一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确定对涨幅较大的成品粮及其制品,食用植物油,猪肉、牛羊及其制品,鸡蛋、牛奶,液化石油气等六种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提价申报和调价备案制度。因此,实施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法律依据是充分的,程序也是正当合法的。

这次政府采取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主要是规范市场秩序,遏制价格不合理上涨和稳定群众预期,为制定新政策和既有政策发挥作用赢得时间,也为企业发展生产、增加供应和安定群众生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此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主要采取提价申报和调价备案两种方式,要求不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并不是冻结价格,也不改变企业自主定价的性质。政府干预的是企业的不合理调价,并明确规定,如无正当理由,不得要求企业亏损经营。

在特殊情况下依法对市场价格进行适当干预,并不是我国的独创之举。政府对市场进行适当调控,弥补市场失灵,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不管是美国、德国、法国等欧美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俄罗斯等转轨国家,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都有政府控制、干预价格的法规和先例。例如,法国1986年12月1日颁布的关于价格自由和竞争的法令中规定,在出现特别状态、公共灾害或某个领域市场明显不正常状况等情况下,政府有权决定采取临时性措施,限制价格的过度上涨;新加坡有专门的《物价控制法》,规定其价格主管机关(物价管理局)可以通过在公报上发布命令的方式规定某商品或服务的最高价。从实践来看,各国也

都有在紧急情况下干预价格的先例。日本政府在1973年石油价格暴涨时期曾对钢材、盐、酱油等59种商品的提价实行事前申报制度,对特大百货商店的价格实行限制。美国历史上也曾采取过短期内冻结价格的行政干预措施。欧盟2005年对食糖实施价格干预,并且一直对食糖采用生产配额管理。最近,韩国政府决定对部分公共产品设定价格上限,不允许有关企业在2008年上半年内上调水费、电费和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收费标准,并引导有关企业下调电信费和燃气费的收费标准。

对政府依法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做法,人民群众是拥护的,大多给予了正面评价和充分肯定。这些说法和态度,也表明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是及时、适当、得民心的。

(《人民日报》1月25日特约评论员文章)

# 无“深意”的市长鞠躬其实有深意



【中国观察之榘榘专栏】

鞠躬被认为是我们的老传统,但有些人似乎并不认为这样的传统礼节适用于领导官员。否则,为何领导一鞠躬,就容易被解读出其他的意思来?“北京市代市长郭金龙回应‘三鞠躬猜想’,称此举没那么复杂”的新闻,就是由领导的鞠躬引起的。

据《京华时报》1月22日报道,北京市代市长郭金龙在作《政府工作报告》结束后,起立向全体代表三鞠躬。郭金龙在平谷团参加审议时,张朝代表透露了大家对代市长三鞠躬的猜想:“我们认为代市长一鞠躬是说向代表报到,请多关照;二鞠躬是说报告作完请代表审议;三鞠躬是说……”郭金龙笑着说:“我没有那么复杂的心理。”郭金龙解释说,自己的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也不够流畅,但所有的代表都聚精会神,并给了如此热烈的掌声,他激动的心情不能表达,就按中国的老传统作了三鞠躬。

领导的一些言谈举止被解读出其他的意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譬如,有的领导在某个职员肩上拍了三下,可能被理解为他开始重视这个职员了;

有的领导题字,把“风华正茂”的“茂”少写了一点,就有人打圆场,说书法是允许这样写的。

我这样举例,并无讽刺有着另类理解能力的人们。尽管夸大领导言行含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有一个特征却是“新鲜”的,那就是被夸大与误读的一些领导言行。假如领导的鞠躬、拍肩、拍手等亲切行为在公众中间只是一种习惯性动作,想必人们不会练就如此丰富的理解能力。

有学者认为,官场上的奉承是权力至上氛围下的一种习惯。历史上,权力的神化不知造就了多少另类解读的高手,人们并不认为这样的人是“傻瓜”,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宋仁宗时的奴才宋彭生为宦官李宪洗脚时,赞叹李宪的脚香,并不是他的嗅觉失灵了;东晋殷仲文解释皇帝睡塌了床时,称是皇帝圣德深厚,床都载不动,当然也不是因为殷仲文不懂得木板腐朽的道理。随着历史的演进,在民主改革的进程中,此类“感觉失灵”的事例,变得稀少,甚至成为新鲜事,无疑有值得称道的一面。

可见,郭金龙市长专门回应三鞠躬的含义只是传统礼节,并无其他深意,这看来平常,但其背后是有深意的。这个事件的启示在于,领导官员应当进一步弱化权力思维,强化与公众的感情基础,深化民主建设。唯有如此,才不至于使得下属及公众理解出现偏差,从而能将心思用在工作上,而不是用在揣摩领导的言谈举止上。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

# 在焦虑的列车面前,我们都是“冷静”



【中国观察之十年砍柴专栏】

安徽的女大学生冷静在春运的第一天就殒命列车车轮之下。事后媒体做了好几种假设,其中一种假设是如果她不要把14日的座位票改签成13日的站票,这场悲剧多半可以避免。悲剧的因由之一竟然是这位女孩回家心切,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1月24日的《南方周末》报道说,铁道部部长对冷静的死感到很痛心,其实痛心的又何止他一个。

在外的游子,有几个人不是想早一点回到温暖的家中?家,是人心最好的休憩地,这个家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韩国亦有中秋、春节各条公路上大堵车的报道,韩国的版图才近10万平方公里,其探亲潮比起广土众民的中国,是小巫见大巫。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春运一年比一年紧

张,交通条件的迅速改善,依然赶不上汹涌的“民工潮”、“学生潮”。

这种春节国人南北迁徙的潮流,几乎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没有哪个时期的人口像这二三十年来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地流动。我们的民族几乎成了一群候鸟,集体迁徙在天南海北之间。传统中国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除了宦游在外的精英,飘荡江湖的侠客,一般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背井离乡。人们把离乡在外的旅程视为畏途,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因为一个人离开了熟人社会的庇护,而传统的政府是为农业社会设计的,陌生人构成的外面世界里,有太多人不可知不可控的危机。

可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中国社会经历着历史上最剧烈的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离开故乡,去外面谋生。但刚刚转型的社会里,多数人并没有完全融进都市,他们生命的根还留在故土,他们的灵魂几乎被割成两半,一半属于谋生城市一半属于故土。春节,是亲近故乡,家人团聚的最佳时间段。这便是这些年春运潮持续

不退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面对转型期出现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农业社会的管理思路显然陈旧不堪,人们需要和时代一样进步的公共服务,但在许多方面,相应的公共服务是滞后的。长平先生评价冷静的悲剧时说是因为不被信任的火车导致。因为这些买着站票的旅客们对能否挤进车,在车上占有一个更好的位置没有把握,只有靠人类最原始的竞争——靠力气抢占一块立足之地。可不被公众信任的何止是“火车”?几乎一切公共服务,都是这样的“火车”,人们唯恐自己被拉下了,拼命地往前挤,最后酿成一些穷人相互伤害的悲剧,如被挤到车底下的女孩冷静。冷静被挤倒在车轮下几乎是一种隐喻,隐喻我们这个时代普通人对于公共服务的渴求和窘境。买机票的人不会这样挤,是因为他们对后果有准确的预期——不出现重大问题飞机不会撤下有票的旅客。可是,我们这个国家,大多数的“候鸟”,不是坐飞机而是坐火车汽车迁徙的。针对这种现实,公共政策的设计者要把重点放在坐火车的人身上而非坐飞机的人。如果一种公共政策出台,让人感受到总是那些相对强势的人占

便宜,那么人们对所有政府提供的“列车”可能都有不信任感。人们生怕过了这村没那店,凡事都要抢在前面,这就是即使两个人也不愿意排队上车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时刻担心面前的那辆车撤下自己呼啸而去。当然,这种社会现象的造成,和中国人口庞大人均资源少的现实有关,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否则就不能解释人口更为稠密的日本,为什么公共秩序良好,而地广人稀的阿根廷在金融危机后秩序混乱。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公正,尤其是能否保障弱势群体、多数人的利益。只有公共政策的让公众有对政府信心,从而对搭乘的火车,对旅途中的陌生人,对自己顺利平安抵家,都有足够的信心。弱女子被挤倒在车轮下的悲剧才可能尽量避免。

亿万个告别田野的中国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这个民族这一百多年来,何尝不是在找一个温暖的家园?我们曾经过于急躁过于焦虑,走过了好多弯路,受过了许多挫折。回家的路,请慢些走,只要家园的方向不迷失,总会平安到家。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 世俗追问在高尚面前没有答案

## ■热点纵论

辽宁普兰店包工头原立宪投资1300多万元修建了普兰店市唐房烈士陵园,兴建了烈士纪念馆。他的梦想是终生守护普兰店市唐房烈士陵园,为280位烈士尽孝。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原立宪这样做的呢?面对人们一遍又一遍相同的追问,原立宪总是回答说:“没有答案。”(1月24日《半岛晨报》)

原立宪这个“没有答案”的答案,其实正是对无数追问者恰如其分的回答。因为,在原立宪高尚的精神追求面前,这些世俗的追问的确是没有任何答案的。现在很多人对于物欲的崇拜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一切,甚至包括亲情、爱情和友情等一切人们曾经认为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就拿那些逝去的烈士来说吧,现在有些人不但来不守护或祭扫,反而会为了眼前的利益让他们的遗骸不安身之处。前些日子闹得沸沸扬扬的洛阳烈士陵园烈士墓地遭

到毁坏事件,就非常典型。尽管有关部门再三解释说什么“改建陵园”云云,其实谁心里都明镜似的:不就是因为将烈士墓地开发为商业墓地能够赚钱吗?在金钱物欲面前,一切高尚的精神追求,一切对烈士英雄的缅怀都成为了稀缺品,而一旦有谁真正拥有了这种追求和情怀,马上就会有人按照自己世俗的想法对此加以丈量,进而表示怀疑。原立宪在开始投资建设陵园的时候,就不断有人质疑:“他这人肯定有野心,有别的目的。”“他是在个人炒作,就是想出名呗!”“道不同,不相与谋”,试想,如此无聊的非议和世俗的追问究竟让原立宪如何去分辨和回答?他除了不予理睬之外,也只能是“没有答案”的回答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别人不是原立宪,谁也无法体会原立宪心灵深处的那种追求和那份执著。没有人要求你要像原立宪那样,但至少,你能停止那些世俗的追问吧。(李先伦)

## 【1月24日读者挑剔】

1. 读者潘先生等:1月24日A3版《重大城建工程听证要立法》第三段第五行、第六行、第七行中三处“听证”应为“听政”。(记者:张波,编辑:赵勇,校对:熊向宁)

2. 读者潘先生等:1月24日A5版《回应百姓之盼》第一个小标题第三段倒数第四行中“工资新收入”应为“工资性收入”。(记者:郑春平,编辑:杜雪艳,校对:姜锁平)

3. 读者滕先生等:1月24日A32版《黄健翔下月回渝祭祖》第二个小标题第二段第一行中“祖父”应为“曾祖父”。(编辑:王振,校对:许元华)

快报向广大读者致歉,欢迎挑刺,电话:96060。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任贞朝之死”是对正义更悲凉的叩问

## ■热点纵论

公民魏文华之死让城管制度之弊引发国人全面反思,女大学生冷静之死则让铁路运输超载、管理混乱等顽疾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现在,又一位公民成为了大事件中的非正常死亡者——他叫任贞朝,是轰动一时的“齐二药假药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任贞朝一直在等着一场官司的判决。这场官司,是他与其他受害人一起起诉销售使用致命假药的医院和药店,但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判决结果依然杳无音信。而此时,此案已经审理了9个多月,早就超过了民事案件6个月内审结的期限。

(1月24日《广州日报》)我不知道任贞朝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我想,这里面肯定会有失望乃至绝望的苦闷。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以“因案情重

大,需再延长半年判决”为由一拖再拖,最后拖得“齐二药假药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都在绝望中离开了人世。任贞朝的代理律师说“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

我不知道案子的审理会不会因为任贞朝死亡而加快进程,但即使是法院马上作出判决,满足了任贞朝的所有诉讼请求,这一切也已经对他毫无意义了,因为他已经带着遗憾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更不敢去作这样的设想——“齐二药假药索赔”会因为任贞朝之死而对被告的医院和药店有利,毕竟,任贞朝是这起悲剧中最直接的受害人和证人,他的存在,对案件的审理走向不言而喻。现在,任贞朝死在了对判决的苦苦期盼中,这难道就是法院久拖不决所希望看到的吗?

我实在不明白,“齐二药假药事件”事实如此清楚,又有什么“重大案情”需要将

判决一拖再拖?还有什么比让法律还受害人一个公道更紧迫的?一个公民,他的身体被层层把关后的假药伤害得奄奄一息,他只能寄希望于法律能给他一个说法,并且,在法定期限内得到司法裁决结果,也是任贞朝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啊,为什么,这项与那么多条生命紧密相连的权利,却被法院如此藐视,却像空气般看不见摸不着。本该6个月审结的案子审了9个多月仍悬而未决,难道当地的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不应该给个说法吗?法院为什么就能随心所欲地决定正义来临的时间?

最可怕的不是没有正义,而是我们等不到原本可期的正义。逝者已矣,任贞朝已经等不到“还我公道”的一天,他的死亡,不像魏文华和冷静之死一样突然和有爆炸性,但他在等待正义的时间里耗掉了自己的生命,难道不是对制度缺失更悲凉的叩问吗?(林珊)

# 清除“官话套话”关键在领导

## ■公民发言

在重庆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提案现场办理会上,一位官员的发言进行了大约10分钟后仍没有说到实质性的内容。这时,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突然打断了发言,“这种场合就不要说这些官话了!没有必要!”他希望办理单位不要说些对解决问题没有实质帮助的套话,而要认真提出有可行性的办法。

(1月23日《重庆时报》)严肃会议纪律、改进会议作风、减少会议数量的通知和撤掉文山填会海的文件不知下发了多少遍,甚至为了开短会,有的地方规定了每人发言的时间,可各地的官员们仍然身陷会海无法自拔。时间一久,能否在会议上滔滔不绝地讲官话、

大话、空话、废话,似乎也成了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成熟与否的标准了。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形式主义的会议,提倡务实的、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

据报道,在此次重庆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提案现场办理会上,自从黄奇帆插话之后,会风立刻有了戏剧性的改变:接下来的发言不再从发言稿的第一页看起,而是直接跳过了5页大约近一半的页数,翻到中间才开始说:“我们针对这个提案将采取以下举措……”省却了之前整整5页关于“高度重视办理工作”、“认真领会提案精神”等废话。如果这样的经验能推广之,其效果一定不错。由此看来,要切实改变会风,还有赖于高官的以身作则。(张兰英)